



# 華山文集

華山  
著

出版



华山像



华山木刻作品

## 难忘华山(代序)

华山同志去世已经十几年了。也许,有些年轻的编辑记者已经不知道华山的名字了。但是,凡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对新华社记者华山气势磅礴的战地通讯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时代前进了,党的新闻事业已空前发展,我觉得,新闻界不应该忘记华山同志,不应该忘记他给我们留下的那些宝贵的、纪录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新闻精品。

### 战地记者中一颗耀眼的星星

我与华山相识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抗战胜利后,我随新华社的先遣队从延安赶赴东北,途经承德时,被留在《冀热辽日报》工作了几个星期。这时,华山正在该报当记者。报社的编辑记者不多,吃住都在一起,几天下来,大家就熟悉了。华山给我的印象是:尽管他言语不多,但待人、做事都满怀激情。加上我们先后都在延安鲁艺学习过,所以很能谈得来。不久,党中央电促我们先遣队立即赶往东北,我便与华山匆匆地分手了。半年后,我读到了他采写的战地通讯《承德撤退》。那慷慨激昂的“我们还要回来的”的誓言,是那样铿锵有力,震撼人心,我从心底为他写出这样的杰作而高兴。

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在东北战场那段艰难岁月中建立起来的。1946年年底,我在哈尔滨《东北日报》和新华社东北分社工作,华山几经辗转也调来担任特派记者。这次重逢,使我们之间的

友谊就更加亲密了。当时，我负责采访部，华山分工报道军事，大部分时间都跟随部队采访。他在长白山里踏过摇头甸子、红眼蛤塘，在大森林里和伐木工人睡过火棚子。东北的冬季特别漫长，零下三四十度是常见的天气，大雪泡好像白色帷幕覆盖着茫茫原野，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就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华山常常跟战士们一道没天没夜地行军、作战。那时，前方记者没有条件配备电台，发稿一般是邮寄。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邮件往往延误丢失。若是有一段时间收不到华山的来稿，我就通过军队指挥系统打听到华山的行踪，派报社通讯员到部队去找他。这样，一月左右去一次，每次都能带回两三篇稿件。所以当时华山的一些稿子，大多是首先通过我编发出去的。战役间隙，华山也多次回哈尔滨休整。每次从前线回来，他总是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的，有时还穿着日本关东军的皮大衣，戴着大皮帽子。那副模样，仿佛至今犹在眼前。

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先陪他去理发、洗澡，然后用菲薄的津贴和稿费一道去吃一两顿华山最爱吃的俄式西餐，再看一两场苏联电影。晚上，我们常坐在他那间小屋里聊天，一杯粗茶，一堆东北马合洛烟叶，自己拿纸卷着抽。屋里升腾着散不开的烟雾。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对事业的追求，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似乎有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有时直谈到东方发白。

1948年初秋，东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预感到“打硬仗、打恶仗、打大仗”的时刻到了。华山去了锦州前线，我则去了长春战场。依依惜别时，我们相约“沈阳再见”。没想到，此后的战局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华山一路顺风，跟着先头部队强渡大凌河，打锦州，战辽西，消灭廖耀湘兵团，直到解放沈阳，真是纵横驰骋，好不开怀；而我却陷在长春外围，几个月也没有打上一仗。直到东北全境解放，我从哈尔滨赶往沈阳时，华山已随着部队进关参加平津战役去了。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是华山新闻生涯中最壮丽的一章。他的许多反映解放战争的名篇，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的作品总有一种磅礴的气势，充满着一个人民记者同人民战士们一道在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的革命豪情。他善于从整个战局出发，融入丰富的生动的第一手材料，既写出了战役的全貌，又揭示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战斗过程，使广大读者从中看到我军指战员各具风采的英雄群像，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显示出我军必胜、敌人必败的历史发展趋势，犹如冲锋的号角，前进的旗帜。他的作品，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纪录。在当时众多战地记者中，华山是一颗耀眼的星星。

平津战役后，我随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华山转入对工业建设的报道，去鞍山、大连等地采访。等我从前线调回总社后，他又去了朝鲜战场。此后，我去了上海分社工作，只是在回北京开会的时候，与华山有过几次短暂的相聚。

1954年冬，新华社组织一批业务骨干去苏联学习，我与华山同乘一列火车包厢，整整旅行了九天九夜。沿途西伯利亚的大森林，贝加尔湖的风光，深深地迷住了我们。我俩常常痴迷地扒在窗口，长久地凝视着窗外的景色，好像又回到了在哈尔滨的时期，开始漫无边际的聊天。从西伯利亚迷人的风光谈到俄罗斯优秀的传统文学，谈到二战期间苏联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在苏联，我们共同生活了三个月，除在塔斯社学习外，还游览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每次参观游览，我都与华山结伴而行。尤其是参观艺术类博物馆，我俩兴趣最大。华山学过木刻和美术，对俄国古典的油画和雕塑特别钟情，往往别人都走了，我俩仍久久不愿离去。使我永远难忘的是，那次在列宁格勒，华山对那座世界著名的雕塑“青铜骑士”简直着了迷。他拉着我围着雕像左看右看，赞赏不已。当时我俩多想在雕像前照张合影啊，但那时我们没有相机，未能如愿。这件事以后我们曾多次提起来，总觉得是平生一大憾事。

1990年，我去苏联访问，又一次来到这座著名的雕塑前。当时蓝天白云，阳光灿烂，青铜骑士的雄姿依旧。回想三十多年前我同华山在此的情景，真是触景伤情，不胜感慨！如今，斯人已经逝去，我手上纵有这最好的相机，又到哪里去找华山合影呢？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 长期生活在工农兵之间

华山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记者。他的成就首先源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忠诚，对于党的新闻事业的热爱。像别的许多老一代记者一样，他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的。对于他来说，新闻记者的笔就是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战斗武器。他长期与八路军指战员一道行军作战，一道做群众工作。火热的斗争生活，不仅使他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报道，也锻炼、培养了他艰苦奋斗、深入采访的优良作风。

许多见过华山采访的同志都知道，他的采访笔记记得非常翔实。一般是把采访对象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哪怕是细枝末节，也尽可能地不漏。他曾对我讲过，他记笔记的习惯是在太行山上养成的。当时，他去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采访，发现许多指战员都善于讲故事、善于描述自己的生活，而且语言非常生动、幽默、风趣。于是，他开始记笔记，记的都是对方的原话，尽管材料杂七杂八，但翻开整个笔记本，就像部队生活的一面镜子，能理出许多采访线索和报道素材。特别是群众那些鲜活生动的语言，简直是个宝库。

解放战争初期，他写过一篇《头顶露青天》的报道，反映新解放的赤峰乡下一个贫苦回族老妇人对伪满汉奸恶霸的控诉。华山前后访问了三次，详细记录了老妇人的原话，那真是字字血泪，满纸悲愤，铁石心肠的人读来也会为之动容。文章中那些真挚、朴实、感人肺腑的群众语言，我至今难忘。

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华山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令在抗美援朝前线那样严酷的环境里，他的日记也从未间断过。有些笔记或日记，是他在战壕或坑道中“坐在脚后跟上，就着膝盖”记下的。当年同华山一起在东北战场做记者的刘白羽，曾在一篇悼念华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认为这些笔记就是华山遗留下来的文学财富，这里装着他的智慧、热爱、信仰、希望和文采，如果印一本《华山手迹》出来，就是华山生前不曾发表的一大部文学作品。”

华山常说：“不是我亲自采访来的材料，我是从来不写的。”他常常到前线战斗部队中去，与战士们滚在一条战壕里，接受火火的洗礼。为了全面地、立体地反映一次战役或一次战斗，他除了采访主力部队，还要采访搞情报的，打掩护的，打配合的，打钳制的。1947年冬季，他顶风冒雪，从松花江到辽河，与作战部队一道穿插于敌人后方，亲身体会了我军南北满部队会师的欢乐；辽沈战役期间，他先随先遣团强渡大凌河，参加攻锦会战，而后又直下辽西，强渡巨流河，歼灭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奔入沈阳。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亲身感受，他是写不出《踏破辽河千里雪》、《英雄的十月》这样不朽的篇章。

长期在战士和群众中生活和采访，华山不仅写出了一篇篇不同凡响的报道，更重要的是，这帮助他牢固地树立了群众观点，培养了他热爱人民的优良品质。他不是理论家，但他的话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再不如你的群众，也会有一点两点比你强！”“群众天天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自然要说出前人没有讲过的话。”他还说：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是力量的海洋，智慧的海洋，每天都汹涌澎湃，生生不息。如果你善于向海洋学习，你的知识，你的力量，不也像海一样的广阔了吗？”今天，重读他的这些富有哲理的真知灼见，仍然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更为可贵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华山一如既往地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长期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从朝鲜前线回来后不久，他就去三门峡工地采访，还到大西北



跑了一趟，写出了《童话的时代》、《远航》、《大戈壁之夜》以及《神河断流》等名篇，热情讴歌了新时代创业者的辉煌业绩和奉献精神。

1957年华山调出新华社，进了作协，他把全家都带到了三门峡工地，长期在那里深入生活，并代职工程局党委副书记。我从上海分社调回总社后，曾去看望过他，受到他全家的热情接待。他让我戴上安全帽，领着我在大坝上参观，并亲自为我讲解。每到一处，工人们都亲切地喊他“华书记”。他的房间也是人来人往，向他汇报工作或是商讨问题。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来蹲点体验生活的作家，他的身心完全融入三门峡工程中去了。

在三门峡的那天晚上，我俩几乎彻夜未眠，这时的华山对开发大山大河的伟大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这又是一场面对大自然的大战，他又有了写不完的可歌可泣的新人新事。他跟我讲了许多关于黄河的传说和歌谣，还讲了一段情节曲折动人的老艄公的故事。看起来，他对黄河、对黄河的老艄公、对改造黄河的伟大理想简直着了迷。华山平时讲话有点结结巴巴，但那晚他说起话来恰似“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说到兴奋处更是斩钉截铁，听得我浑身热血沸腾，真想跟他一起投身到这场对大自然的战斗中来。我鼓励他赶快把这些精彩的题材写出来，后来华山果然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名叫《中流砥柱》。但不知为什么，他改了又改，却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

华山在三门峡工地的五年，生活得很充实。丰富的实践，更坚定了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决心。三门峡工程完成后，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华山又转到河南林县去体验生活。这期间他走遍了林县的山山水水，先后写出了颂扬红旗渠的长篇报告文学《旱井世界》、《劈山太行侧》，以磅礴的气势，生动的群众语言，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事业。有一次，我专门到林县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了治疗肝病的药品。当时，他住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名叫胡家庄的小村里，两间石砌的小屋，用石灰粉刷的墙壁显

得很洁净。屋里生着煤炉，平时他一个人住在那里，自己做饭吃，生活相当清苦。那一段时间，他的肝病经常发作，我劝他回郑州或北京治病，却怎么也说不通。他说：“和老百姓在一起，我才活得痛快。”我相信这句话，更理解华山的心情。在我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作为一名记者，华山从没有离开过群众。战争年代他长年累月随军作战，一直生活在战士之间；解放后，他蹲鞍钢、访大连，直到在三门峡一住五年，又结交了不少工人朋友；如今，林县山区的农家小屋，更成了他同农民朝夕相处的家。在老一代记者中，他是少有的几个长期生活在工农兵中间的记者。他常说，做记者决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旦脱离了，记者的职业生命也就完结了。

华山在林县断断续续住了十几年，这期间，他曾给我写过几封信，其中一封谈到他在下面的生活体会，真实、感人，非常精彩。这封信我原本一直珍藏着，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我觉得，一个记者能自觉地离开大城市，长期坚持在基层蹲点，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即使在老一代记者中，华山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个。

## 刚正不阿敢于坚持真理

1966年初，我和冯健、周原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华山看后很激动，曾叫人带信给我，要我一定再到林县去一趟，写写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和那些修建红旗渠的英雄们。不久，我应邀前往，华山非常高兴。整整三天时间，他领着我跑遍了红旗渠的整个工程，还陪我一起访问了杨贵、马有金等县委领导人，并和修建红旗渠的劳动模范路银、任羊成、常根虎、王师存等见了面。正当我们准备深入采访的时候，没想到国内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不得不匆匆赶回北京，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报道红旗渠的计划也不得不被迫中止。这件事对于一个记者

来说,无论是我还是华山,心灵上都是一个难平的创伤。

华山为人正直,性格倔强,在重大问题上不管遇到多大压力,都敢于坚持真理。他的这一刚正不阿的品格在“文化大革命”中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先被河南文联的造反派揪回郑州批斗,后又拉回林县劳动改造。此时,林县已被造反派闹得昏天黑地。他们诬蔑林县是“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三自一包’的样板”,诬蔑红旗渠是“黑旗渠”,还说,“一条小小渠道有什么了不起”,“杨贵不是个好东西”。对于这些攻击,华山实在听不下去,只要有可能就挺身而出同造反派争辩,为此他也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七十年代初,林县筹备召开党代会,基层的党员推举华山为出席会议的代表,但由造反派把持的“筹委会”却以各种借口不让华山出席。七争八争,双方各不相让,最后华山以“特邀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会议。当会议肆无忌惮地攻击红旗渠和杨贵时,华山忍无可忍,义无反顾地站起来作了发言。他以确凿的事实历数红旗渠的伟大成果和杨贵的功绩,但是话没讲完,就被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轰出了会场。

1972年10月,康克清同志到林县考察,华山给康大姐写了一封长信,全面反映了林县的问题。信中用大量事实,揭露造反派在当时河南省军管负责人的支持下,极力否定红旗渠,残酷迫害杨贵及修建红旗渠的大批干部群众的种种罪行。康大姐看后觉得问题严重,第二天即派专人回京,把华山的信送给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传阅。周总理看后非常生气,当即批示要河南当时的军管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赴京汇报。会上,总理严厉批评了他们否定红旗渠的错误,质问他们为什么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建造的红旗渠那么仇恨?当说到他们残酷迫害干部群众时,总理说:“我看了你们整他们的材料,我实在难过!……”说到这里,总理气愤的流下了眼泪。总理要他们说清楚为什么这样仇恨劳动人民,当场质问那个河南军管负责人:“你说‘一条小小的渠

道有什么了不起，小小的红旗渠你修了几条？”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这次会议及时地制止了造反派在林县的倒行逆施，并解放了杨贵同志。同时，周总理还亲自提名，建议华山作为河南的代表出席全国四届人大。

这件事，华山生前很少向人提及，我还是以后听杨贵同志谈起的。直到九十年代，我见到林县的同志，他们还一再说：老华是个好同志，他对红旗渠很有感情，“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林县人民永远忘不了他。

1980年初夏的一天，华山来看我，说他很想念太行山，想再去那一带跑一圈。我见他脸色蜡黄，身体瘦弱，肝病似乎更加严重了，劝他好好休养，调理好身体再去。他说：“还是老毛病，没关系，只是不想吃油腻的东西。趁跑得动还是多跑跑好。”以后他从太行山回来，在我家里住过一晚。记得那天我俩曾沿着新华社西门外的佟麟阁路来回散步，他心情很不好。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他沉着脸说：“干革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还你斗我，我整你，没完没了？”谈到老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华山很激动，愤愤地说：还不是同过去一样贫困！接着，他无限感慨地说：“太行山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为支援战争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援，就不会有太行根据地，就不会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全国解放已经几十年了，谁能想到，老区人民的生活还同当年一样贫困！看到这情景，作为一个党员，一个曾同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人，我从内心深处感到羞耻，感到内疚。”说到这里，我从他闪着泪花的眼睛里看出了他一片爱国忧民的心境。我鼓励他把所见的情况反映党给党中央。后来听说他写了份材料，但我始终未能看到。

## 病床上依然争分夺秒

“文化大革命”后，华山回到了新闻界，任《人民日报》驻广州的

记者。那几年,我很少见到他。1984年国庆节后,突然听说他的肝病已转为肝癌,在广州病倒了。后来又听说他做了手术,身体恢复得很快,我为他庆幸,为他高兴。我深感华山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无论是生活的积累、思想的积累、感情的积累,都应该到了喷发的时候了。我多么希望他能摆脱病魔的折磨,再多做些事情啊!没想到1985年春节,他的病情又突然恶化,已经卧床不起了。在此期间,我曾托周原同志到广州探视过他。他自知宝贵的日子已不多了,谈到再不能到群众中采访、谈心时,他流下了眼泪。他让周原带话给我,希望我能催促出版社,把他的《朝鲜战场日记》尽快出版,遗憾的是,当这本书匆匆赶印出来时,华山已经去世,终是未能看到它。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华山在病重期间仍然表现出一个坚强的新闻战士形象。凭着口述录音,由他的女儿点点滴滴地整理,他写出了情深意长的长篇散文《青青海罗衫》,浸透了他对为之奋斗终生的党的事业的绵绵厚爱,也寄托了他对党和国家走出“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重整旗鼓、开拓奋进的殷殷期望。此外,他还在病床上争分夺秒写出了几万字的《我当记者》,总结了自己几十年记者生涯的经验。这是他用最后的气力,最后的心血,一点一滴,一字一句铸成的。这需要多么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啊!

1985年9月,再次传来华山病危的消息,当时我因中央开会无法分身,只好派我的大儿子穆东平去广州,与分社的同志一道去探望华山。东平来到华山的病床前,俯下身去,握着他的手问道:“华叔叔,你还认得我吗?”华山笑着答道:“你是东平,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怎能不认得。”当时,华山瘦得皮包骨头,自胸部以下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只有头脑还是清醒的。那天他特别高兴,兴奋地说了许多话。他说:“我和穆青是老朋友了。在战争年代,我们一道在东北工作,我们的友谊是在战争岁月里建立起来的。当年的环境是那样的恶劣,生活是那样的艰苦,但同志之间团结互助,同仇敌忾。感情是真挚的、深厚的,没有虚伪的东西。我们就是靠

着这种团结友爱的精神，战胜了今天人们想像不到的困难，走向胜利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之间的友情仍然是那么深厚；那么珍贵。”

他让去看望他的同志和东平转告我两点意见：“我和穆青都不是从研究新闻的定义和理论做起的。我是先成为一名革命战士，然后才成为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的。许多老一代新闻记者都是这样。现在有些人搞新闻研究，是关起门来从定义出发进行研究的。新闻的定义和新闻的理论是需要研究，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实践更值得研究，应该从新闻实践来探讨新闻的理论，而不是相反。如找不到黄河的源头，说它有多长，总说不清楚。革命战争年代的许多名篇，今天读起来还是那么感人，使人信服。相反，1957年后有一些新闻，就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主要是不真实，不能实事求是。我们的新闻研究工作应好好总结一下，检查一下，不要再脱离实际、关门搞抽象的研究了。”

他说：“新闻界要取信于民，就应该反一反不正之风。记者着了官迷，就是不正之风的一种。这种风气现在正日趋严重。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官半职，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官。别人问我是什么职务，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我最低的职务是记者，最高的职务也是记者。’新闻界如果不整掉这种不正之风，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临别时，华山从枕头下的书本中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东平说：“这是我和你爸爸年轻时的一张合影，那是五十年代初，我去参加抗美援朝，他去上海工作，我们俩在总社大门口的石磴上照的。多年来我一直带在身边，现在……交给你爸爸，留个纪念吧……”

十天之后，华山就去世了，他走得很平静也很突然。噩耗传来，我好多天都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我悲痛我国从此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记者，我自己失去了一位难得的挚友。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这么急。当时，我还一直抱着希望：想着等我摆脱身边的杂务，一定要飞到广州，坐在他的病榻前，握着他的

手，听他倾诉，与他叙谈。我相信他会像年轻时一样，发出朗朗的笑声……现在，一切都晚了，永远无法弥补了。最后没有能见他一面，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含着泪水，忍着难言的悲痛，我为他写下了一幅挽联：

## 英雄十月辽河冰雪驰骋疆场领一代风骚 童话时代戈壁异彩纵横笔墨传千古雄文

一代名记者华山是当之无愧的！

华山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山西省左权县麻田乡的清漳河里。那一带是他早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地方，也是他的战友何云等四十几位同志血染疆场的地方。华山与他战友们的英灵同在，与他终生热爱的巍巍太行同在……

追思华山的一生，使我感慨万千！他从太行山上献身于党的新闻事业起，到回归太行山中去，在风霜雷电的人生之旅中，华山留下了多少瑰丽雄壮的华章，如号角，如战鼓，激励着人们前进！他身上凝聚着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闪现着他独具的智慧、刚直、勤劳的光彩。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疾病的折磨，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的人生理想之歌尚待尽情高唱。他走得太早了，太早了，人们为他惋惜，为他悲痛。但他的作品，他的凛凛风骨，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华山曾在自己的《朝鲜战场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不幸死了，就大哭一场，把我忘掉吧。……对于记者，最好的怀念，就是让未来充满阳光。”是的，但我要说，不管在什么时代，我们都不能忘记那些曾为让未来充满阳光而英勇战斗的战士。

遥望巍巍太行，我默默呼唤着华山的名字：华山！我的好战友，苍天有灵，或许你会听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友对你的思念……

## 前 言

正值我们满怀悲喜交加的心情，将久已摆上案头的这叠搜集到的文篇华章——《华山文集》整理编纂就绪，甫至付梓之际，社会传媒报来喜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审定，2000年11月8日，将定为首届中国记者节。事件竟如此巧合。华山同志在天之灵，想必当书成之日，又欣逢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节日的诞生，定会热血沸腾，喜出望外，毅然展臂，浑体而拥抱这一为我国新闻界，不，为已建国半个世纪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伟大中国人民的喜庆节日而欢呼！

华山原名杨华宁，曾化名果讯。1938年春，他到达延安，正式改名为华山。

我于1941年调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华北《新华日报》。我是一名报纸的校对，这时的华山，已是该报享誉整个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一名特派记者了。在当时当地的新闻和文学艺术界中，他不仅是记者群中的一名佼佼者，同时还是经常见诸报纸和杂志的一名木刻美术工作者。他的文学天赋更是不同凡响。名作短篇小说《鸡毛信》，于50年代拍成电影。上映之后，在全国亿万儿童直至成人之中，几近家喻户晓，使整整一代人，受到一次难以忘怀的爱国主义教育。华山的众多作品，不论报告文学，还是散文、新闻通讯，可谓噍噍跳动和充蕴着历史脉搏，时代气韵。人民记者忠于人民。他的每篇文章，无一不是经过深入群众，无一不是和工农兵打得火热而后“磨”出来的。故而极富革命的现实主义风采。



中国人民的首届记者节，响亮地告诫人们，为了真诚并出于现实需要的亟须，庆贺这一节日的诞生，在全国新闻界，也可以说是在整个上层建筑，都应“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继承传统，奔向新世纪”，进行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思想教育。

《华山文集》的问世，恰逢盛代。根据上述庆贺节日的部署，《华山文集》的出版，对当今社会尤对新闻界来说，不啻是降落了一场及时雨。

华山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记者生涯的一生。就回顾历史而言，华山从30年代投身革命，后复由上海进入革命圣地延安，又转战太行山。他以华北《新华日报》特派记者的身分，长期随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进行战地采访。解放战争期间，他又随军参加了解放东北的全过程。《英雄的十月》、《踏破辽河千里雪》，就是全国解放战争决战胜利花苞初绽时期的名篇。全国解放战争的硝烟甫熄，他又三进三出抗美援朝前线。饱含革命激情，浓笔重彩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一经结束，他旋即随苏联专家，驻兰州穿云海，掠空戈壁，开始了对祖国大西北的航测，记述了《大戈壁之夜》和《远航》的前后。报道了苏联赫鲁晓夫是如何背信弃义并欺骗苏联人民从中国断然撤走专家。此时的华山，却踪迹未停，又赶赴三门峡工地，一蹲又是几年。《神河断流》为他的这一深入蹲点，又是如何深入工地，如何和工人打成一片，作了生动的注脚。

之后，也即五六十年代之交，他不失时机地紧抓中国农村变革的典型，又踏向河南林县农民建设“红旗渠”的现场。前后一蹲又是近10年。《劈山太行侧》的述说，与其说是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杰作，倒不如说是全中国农民为改变他们自身命运而奋斗的缩影。